

史学新论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朱大渭

【提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民族融合 用夏变夷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1-0118-06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加入民族融合队伍的不仅有匈奴、鲜卑、氐、羌、羯等所谓“五胡”外，还有乌桓、柔然、高车、蛮、獠、蜀、稽胡等民族。而且民族融合进程持续将近400年之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中古历史进程影响十分深远。以下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1. 儒家民族观。我国自先秦到明清，周边及北方南下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同化与融合，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因而古代先哲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其中尤以儒家为显著。关于儒家民族思想，不少史家多强调其“夷夏之防”、“尊王攘夷”之说。其实，这是儒家针对华夷矛盾尖锐时，夷狄侵扰中夏的现实提出的。我们应当对儒家民族思想体系作全面地理解，尤其是要揭示其进步的一面。康有为在《论语·八佾》注中阐述孔子的夷夏观时说：“故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也；中国而无德，而夷狄也。”他在《论语·子罕》注中又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若经圣化，则野蛮进而文明矣。”^① 康氏对孔子夷夏关系说的诠释，深得其底蕴。《春秋公羊传》把古史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夷夏关系也不同：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是说，夷夏处于平等地位，其地域可以相互转化。故国学大师章太炎指出：“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②

到了战国时代，长期战乱纷争，人民普遍要求统一。儒家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春秋》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站在历史进程的制高点，对华夷关系发展变化作了带本质性的总结。这就是孟子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③ 孟子这个精辟的科学结论，是根据历史真实得出的。他指出，夏禹或文王虽历史时代前后相去甚久，又都出自夷族，但他们治理中国的法度是相同的，都是用华夏文化治理国家，因而都成为华夏文化的开创者。孟子根据夷夏关系发展的历史实际，所提出的“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科学论断，实质上是指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被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所“同化”，而不是相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有五个支撑点：一是“仁爱”、“仁政”、“礼乐”；二是人性善及修身养性；三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是文化教育思想“有教无类”；五是《春秋》大

^① 参见拙著《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一文所引，载《六朝史论续编》，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②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杨伯峻：《孟子译注·滕文公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

一统理论。儒家民族思想理论体系，正是从其学说思想核心出发形成的。“仁”者爱人，“仁政”爱民。夷狄也是人和民，当然在被爱之列。夷狄既是人，性必善，通过教育和修身提高其善行。他们文化虽相对落后，但通过德政“礼、乐”教化，完全可以提高为华夏文化。既然夷夏是兄弟，当然要平等互助，团结和睦。尤其要实现《春秋》大一统天下观，就必须用华夏文化影响、提高夷狄文化，使之相互交融，以实现“夷夏一家，天下一统”。可以说，这是儒家民族观的最终理想。由此，我们发现就儒家整体民族理论而言，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是主要的，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是次要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民族理论体系核心，或者说其内在联系在于，民族文化差异可以趋同，这就是通过民族平等、仁爱、仁政、修身，以及实施“礼、德”教化来实现，其结果华夏相对先进的文化“同化”夷狄相对落后的文化，即孟子说的“用夏变夷”，以达到儒家理想的华夷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

关于民族融合的理论，人们最熟悉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的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这里，马克思所讲的“较高文明”，恩格斯更明确地用比较高的“经济情况”来代替，因为文明或文化决定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如果将孟子的民族融合观，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升的民族斗争和融合理论相对照，我们发现，儒家“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也即在民族关系中，总是先进民族文化“同化”后进民族文化的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民族文化同化的“永恒的历史规律”，其内涵颇为相似。只不过前者是自发地对历史现象客观的叙述，后者是以唯物论观点自觉地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升华，而且前者主要是从我国国内民族融合中得出的，后者则是从世界范围内外部民族入侵别的民族被同化而得出的普遍规律。^①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尤其是属于政治思想的民族理论更是如此。它给以后开明的政治家和哲人深远影响，为其实行民族平等，以及“用夏变夷”的民族政策，或论述有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的甚至自觉地作为“用汉变夷”的指导思想。西汉《淮南子·时则训》继承儒家思想，提出了我

国古代“五位一体”的民族关系模式，其“中央之极”为黄帝“所司”，其余四方祖先都是华夏族的创始人古帝。同书《傲真训》还说：“四夷”与华夏族皆一家兄弟，所谓“万物一圈也”。无论儒家民族思想或马、恩关于民族融合的“永恒的历史规律”，其关键都在于人类先进文化推进民族融合进程的不可抗拒性，即在民族关系发展进程中，文化相对后进的民族必然被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所“同化”。在我国历代民族关系中，汉胡统治者比较自觉地实践儒家民族理论并收到实际成效的，当以十六国北朝至唐初最为显著。

2.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儒家积极进步的民族观，乃源于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和精深揭示。我国先秦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进程，其总趋势同儒家关于民族融合的结论基本相吻合。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我国北方十多个民族前后建立起约 35 个政权，战乱频仍，人民大批死亡流散，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各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人口居多的汉族广大人民群众，与人口较少、生产方式接近的五胡游牧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同时在文化上，则表现为相对先进的汉族农耕文化，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经济形态上，则表现为封建制农业经济与氏族制末期或奴隶制初期游牧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必须解决主要矛盾。如何解决主要矛盾呢？只有用孟子说的“用夏变夷”的方针政策，使各少数民族汉化，在接受汉化的同时进入汉族农业封建生产方式体系中，使得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得到共同的发展和提高，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十六国北朝各类政权，实际上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为主而包含汉族士人在内的多民族骨干参与组成的联合政权（前凉、西凉为汉族上层所建），其统治下的人民，也是以汉族为主包含文明程度参差不齐的各少数民族在内。众多的民族和人口要实现汉化，也即要彻底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各民族传统习惯势力进行阻挠，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和复杂局面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之多民族多元化所组成的政权，各族文化相异所出现的竞争和碰撞，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机遇，以强大的历史合力推动着各个民族、各个家族及其相关的政治军事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奋力抗争或合作的对立统一中求生存、创事功。

无论当时民族斗争和融合如何复杂，它必然受着马

^① 参见拙著《儒学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六朝史论续编》，学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7 页。

克思、恩格斯所提示的民族融合发展进程的“永恒的历史规律”的制约。除了十六国初期后赵末石虎最高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所引起的短期的民族仇杀外，从前秦到隋统一民族融合最后完成的长时期中，除六镇地区和北齐局部及短暂地出现过胡化逆流外，再没有大范围内或长时期内形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民族对抗或仇杀现象。实际上，当时我国北方各主要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皆自觉不自觉地向着儒家民族观所指引的民族融合方向前进。早在十六国初期，李雄在益州建立成（汉），汉族士人仿照汉制定朝仪百官以及各种封建制度。李雄又“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①后赵石勒称王后，建社稷，立宗庙，起明堂、辟雍，司礼乐威仪。并让汉族士人为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以吸取汉族封建政权的礼乐法制，石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又“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②这是用儒学为后赵培养人才。十六国中后期，各少数民族政权更是重用汉族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尤其重视“汉化”的指导思想儒学。如前燕鲜卑慕容氏各代君主都注重儒家教育，慕容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儒生讲学）。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皝雅好古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又崇儒学，“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又“兴律学于长安……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③十六国南凉河西鲜卑秃发氏乌孤、利鹿孤、傉檀三主都谙习汉文化，“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后秦尚书郎汉族士人韦宗出使南凉，傉檀与韦宗“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韦宗感叹：“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指傉檀）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④在韦宗看来，像傉檀这样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同汉族士人一样可以发扬汉文化精义，这在当时胡汉矛盾异常激烈的氛围下，乃是符合汉化历史潮流的振聋发聩之音。北凉匈奴卢水胡沮渠氏，继前凉、南凉在河西保存了汉文化传统，儒学和其他学术思想昌盛。北凉政权与南朝刘宋政权常有文化交往，并曾互相赠书。北魏前期，崔浩、高允等曾助拓跋焘实行汉化并卓有成效。崔浩被诛并牵连许多汉族士人，也只是汉化历史潮流中的一股漩涡逆流而已。崔浩死后，北魏仍继续实行汉化政策，为孝文帝全面汉化打下了基础。

如果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进程作深层次考

察，则可以发现它始终受相对先进民族文化（汉文化）“同化”相对后进民族文化的历史规律所制约，即先进民族文化从各方面无形中対后进民族文化有一种强大的无法抗拒的冲击力和吸引力。这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总是不断地企求物质上和精神上高水平的生存欲望所决定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历史发展在民族关系中的“永恒规律”。因而大批少数民族英明君主和汉族杰出士人，以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认清历史发展潮流，大都以自觉的行动，去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

3. 民族融合在复杂形势下的趋同性。在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进程中，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的前秦苻坚与王猛，中期的北魏孝文帝与李冲、王肃，晚期的周文、武帝与苏绰、卢辩。这三个君臣集体竭力推进民族融合，尽管他们所处时代先后不同，民族类别不同，民族融合发展程度有别，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差异，因而在汉化进程中各具特色，但他们在各方面又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我们称之为趋同性。这是由马恩所示“永恒的历史规律”的制约，以及儒家“用夏变夷”理论也即汉化的指引，加之三个领导汉化集体自觉地实践儒家民族理论等三条所决定的。上述三个领导集体人物的文化素养、治国才能、民族观、品格，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民族融合（汉化）政策和内容及其相关方面，究竟有哪些趋同性呢？

第一，秦王苻坚、北魏孝文帝、北周文、武帝，他们天资聪慧，汉文化水平颇高，因深明汉文化优秀传统内涵及其对本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从而能准确地掌握汉化的指导思想。苻坚“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对汉族历史典籍十分熟悉，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并深得其意蕴。他经学造诣很深，曾巡视太学，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⑤孝文帝元宏，在四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据《魏书·高祖纪》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周文帝宇文泰，

①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②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

③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卷109《慕容皝载记》。

④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

⑤ 《晋书》卷113、114《苻坚载记》上、下。

“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被物，能驾驭英豪”，对儒家治国要旨，识见明睿。周武帝宇文邕“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精于儒学，还通佛、道经义。曾两次集百僚和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①以上四帝，皆崇尚儒家，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

第二，四帝进步的民族平等和睦思想。苻坚提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魏孝文帝曾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周武帝也说：“怀远以德，处邻以义”，从而达到“八纮共贯，六合同风”。^②这是指以德义对待边远四方夷人，使得汉夷混如一家。四位少数民族明君都主张各民族亲如兄弟，团结平等，和睦相处，消除彼此敌对和歧视，在实行“德政”的原则下，逐步推进以汉文化为主的民族融合进程。

第三，秦王、魏孝文、周武三帝在推进民族融合过程中，都具有实行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惩保守顽固势力对汉化的阻挠。如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实行汉化的关键时刻，尚书左仆射穆泰与恒州刺史陆睿联合乐陵王思誉、安陵侯元隆、阳平侯贺头等一批王公重臣谋反，反对迁都汉化。孝文帝当机立断，命元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摧毁了这个牵连宗室重臣百余人的反汉化守旧势力集团。甚至皇太子恂反对迁都汉化，孝文帝也大义灭亲赐恂以死。^③

第四，关于四帝实行汉化的辅臣，各有一个在政治上有较高水平的群体，其中以前秦王猛，北魏李冲、王肃，北周苏绰、卢辩等五位汉族士人为代表。除王猛外，其他四人皆出身高门。他们不但汉文化素养高，而且为识时务之俊杰。前秦王猛虽出身寒士，从其“宰宁国以礼，治乱世以法”及文韬武略看，他深明儒、法、兵家治国安邦之术。他“崇尚儒术”，更易于接受儒家进步民族观，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显然具有儒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取向。北魏李冲深通儒家礼典及治国要旨，且识鉴甚高。王肃为琅邪王氏名相王导之后，“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长于《周礼》、《易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奔魏，孝文帝“虚襟待之，与其论为国之道，肃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④正值孝文帝迁都汉化之时，礼乐朝仪，皆深仰于肃。苏绰“少好学，博览群书”，“有王佐之才”。苏绰制《六条诏书》，不仅显示其汉化文化水平高，而且对两汉以来德法治国之道作了全面深刻地总结和阐述，乃中古治国之宏论。卢辩家“累世儒学”，文帝以其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以顾问”。五位辅臣不仅汉文化水平高，而且深明德法治国之道，能掌握

中央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典制，故能助君主制定出汉化的正确方针政策。

第五，王、李、王、苏、卢等五位汉化辅助大臣，均非一般儒生俗士。他们深刻认识到身处非常时代，必须从儒家进步民族观出发，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求统一、求富强的立场，摒弃儒家“夷夏为防”以及狭隘的汉民族大义、气节、正统之类违时的落后观念，故能认清十六国北朝历史发展的主流，辅佐少数民族英明君王，坚定不移地实行儒家“用夏变夷”的方针政策，以促进在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前提下各民族融为一体，使北方政局趋于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综合国力加强，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其实，三个领导集体的明君贤宰都能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实行汉化乃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晋书》作者指出苻坚、王猛“变夷从夏”；魏初崔浩讲的“变风易俗，化洽四海”；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诏：“故变时俗，远遵古典”；周文帝“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周武帝反复强调的“朝政维新”；都是以不同提法，表明“用夏变夷”的同一思想。上述君臣对当时形势的清醒认识，乃是其自觉地实行汉化的前提。

第六，共同高扬民族融合即汉化的三面旗帜，以证明自己所行的“中国之道”。这三面旗帜分别是：其一，大力兴办学校教育，崇尚儒学，特别尊祀孔子。因为他们深知美教化，移风俗，莫尚于儒。其二，礼教为先，制礼作乐。尤其是孝文帝、周武帝考订五礼，推演雅乐。其三，德刑并举，德治为先。尤其是孝文帝重视援《经》入律，反酷刑而合《经》义。

第七，苻坚、孝文帝、周武帝都积极地谋求全国统一，企盼为朔所归，做一位“后圣”。苻坚“每思天下未一，未尝不临食辍”，“江东未平，寝不暇旦”。^⑤可见他为实现天下统一，已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孝文帝曾多次向君臣表达其欲统一全国的宏图远志。迁都洛阳后，紧接着从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到太和二十三年三月约五年内，三次率大军南征，不幸卒于最后一次南征途中。在临死遗诏中还念念不忘说“迁都高极，定鼎河澶，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⑥周武帝于建德六

① 《周书》卷1、2《周文帝纪》上、下，卷3《周武帝纪》。

② 参见《魏书》、《周书》二帝本纪及《晋书·苻坚载记》。

③ 《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

④ 《魏书》卷63《王肃传》。

⑤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⑥ 《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

年(公元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后,紧接着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五月,匆忙挥师北伐,欲平定突厥解除后顾之忧立即南征,不幸暴卒于北伐途中。周武帝遗诏中也是以未实现统一全国为憾:“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今遭疾大渐,气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息。”^①可见孝文、周武二帝,皆以统一全国壮志未酬为遗恨。

三帝如此热衷于实现全国统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和心态促使其这样做?我们以为除了苻坚因统一北方,西定巴蜀,有数胜而骄的因素外,三帝都急切地期望尽快统一全国,主要为实现儒家民族观“汉夷一家,天下统一”的大同世界,以完成儒家民族理论体系所阐述的全过程,从而做孟子所褒奖的一位“后圣”。

秦王苻坚、魏孝文帝、北周文武二帝,不但雄才大略,有驾驭英豪的才能和魄力,又能克己正人,勤政爱民,任贤选能,从善如流,节俭御物,体验民情,这些作为君主最难全面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苻坚后期稍差)。而王猛、李冲、王肃、苏绰、卢辩等五位辅宰,不仅有治国才略,而且励精图治,孜孜不倦,忠于君主,忧勤王政,廉洁奉公,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是宰臣难于全面做到的,他们也做到了。在上述君臣九人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勇于奉献的优秀精神和品格。他们同其他有关人物一起创造了中古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融合最后完成的丰功伟绩,为唐代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远值得人们称颂。

4. 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十六国北朝加入民族融合队伍,有匈奴、氐、羌、羯、鲜卑、乌桓、柔然、高车、蛮、獠、奚、蜀、稽胡等13个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总人数,经初步考察,大约有11361980人。^②而南朝境内的少数民族,细分起来名目繁多,有蛮、僚、俚、马、蜀、越等名称。其中,蛮、僚、俚三大支居住地很广,人数众多。这一时期,约有300万人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

关于民族融合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首先应当考察被融进汉族的各少数民族族别和总人口数。一般来说,族别愈杂,人口数愈多,则在与汉族融合中,所产生的新基因就愈多,因而其历史影响也愈大。以族别和总人口数而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在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各少数民族1400多万人融入汉族后,其所占比重相当大。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国家领有民户380万,唐代每户约六人,则为2280万人口,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人口约占总数的50%多。如以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距唐建国

已86年)全国民户615万,口3714万计,则少数民族人口融入汉族的人口数接近总人口数的31%。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融入汉族中,无论对汉民族本身的繁衍还是汉文化的发展来说,都被输入了大量的新基因,从而汉族人民在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及文化娱乐等各方面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根据人类优生学原理,汉族与十余个少数民族在血缘上的混合,给秦汉以来的古老汉民族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各游牧民族质朴、强悍的本性被融入汉族人体中,使得雄性性与汉族温良恭俭让相结合,刚柔相济互补,从而带来了新汉族人体素质基因的提高,以及人们创新思维模式活力的加强。李唐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高度繁荣,正是在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给汉民族和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基因的基础上而出现的。

首先,隋、唐两朝皇室均属于汉胡混血统。隋唐建国者杨、李二氏是鲜卑化汉人,其母妻为汉化屠各人或鲜卑人。如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隋炀帝母)、唐高祖母元贞皇后、唐代宗独孤皇后,皆属匈奴别部屠各人。唐高祖窦皇后(太宗母)、唐太宗长孙皇后(高宗母)、唐睿宗窦皇后(玄宗母)皆属鲜卑人。唐开国之君高祖及贞观、开元盛世之主太宗、玄宗三人,皆为汉族与屠各、鲜卑族婚配的混血儿。北朝民族大融合后出现的汉胡混血统李唐皇室,及其所承袭统率的西魏、北周、隋政权最高统治层汉胡后裔集团,乃是缔造李唐帝国和开创唐初盛世的核心力量。

李唐皇室既“源流出于夷狄”,以继承北朝民族融合之政策,故有唐一代大量重用各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才。同时被融入汉族的各族优秀人物在汉文化孕育下,也自觉地奋起登上历史舞台,因而在唐政权政治、军事、文化领域中,少数民族出身的骨干人物为数不少。少数民族出身的宰相、三公三师、名将、文化名人共有82人,他们中不少人在各自领域皆属于顶尖人物,为盛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树卓著。^③显然,这是北朝至唐初民族大融合的直接结果。不仅如此,唐初受北朝民族融合的影响,更大批地重用胡人。仅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五月东突厥灭亡后,除擢用可汗为都督外,其部落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④

① 《周书》卷6《武帝纪》下。

② 参见拙著《魏晋十六国北朝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估测》,《六朝史论续编》,第202页。

③④ 参见拙著《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六朝史论续编》,第242、244页。

所以胡三省在《通鉴》注评“夷夏之分”论者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①李唐建国紧接北朝民族大融合完成后的初期，故能实行最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唐初民族融合仍在沿着北朝以来的形势发展。唐太宗在理论和实践上最彻底地实行了儒家进步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正是他真正实行华夷平等一家的政策，并继续推进民族融合的进程，因而唐前期作为统一王朝，在民族关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我国中古历史经过一次重要的汉胡民族大融合后，汉族机体内被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从而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集中体现在唐前、中期以汉胡混血君主太宗、玄宗为首包括汉胡优秀人物在内的两个杰出的君臣领导集团的宏伟建树之中。其中尤以贞观盛世为重要，因为它为大唐近三百年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唐太宗具有鲜卑族淳朴、豪爽的秉性，又深受十八学士的长期熏陶，深刻领悟儒学及其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加之天赋资质甚高，从而形成雄才大略、满腹经纶、宽厚仁爱、谦虚谨慎、豁达率真等理智与人性高度结合的王者风范和君子作风，使他在施展其高超的政治军事才能时，能高瞻远瞩，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历代兴亡之真谛，从而励精图治，把选才、纳谏、明法、节俭、爱民作为治国的五大要务。他在位的23年内，所任用的贤相、名将、廉吏、文化巨匠足有50余人之多，皆属于历史上各领域的第一流人才。^②太宗真心用贤和纳谏，保证其所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类政策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因而总的来说，唐前期政治较开明，封建专制氛围较为宽松，这有助于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唐初继承并发展北周府兵制，武功最盛，疆域扩

展。唐廷又将北朝的均田制施行于全国，轻徭薄赋，奖励农桑，从而唐建国仅十多年后（贞观四年），经济繁荣，“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经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③同时，唐初的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昌盛。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1200间，生徒3千余人。“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④当时，京城长安成为亚洲文化中心。

总之，从当时民族融合时间之长以及加入民族融合的少数民族之多和总人口数而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规模，可能是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从而我国历史进入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昌盛的崭新局面。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赵俊

① 《资治通鉴》卷108《晋纪》太元二十一年七月胡注。

② 参见拙著《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载《六朝史论续编》。

③ 《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四年。

④ 《新唐书》卷168《刘禹锡传》，《资治通鉴》卷195《唐纪》贞观十四年。

Unprecedente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Zhu Dawei

Abstract: Wei Dynasty, Jin Dynasty, as well a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re periods of China's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its middle ages. The Confucian adopts the ethical concept of "assimilating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pursu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union the whole world. All ethnic people and politicians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sciously practice the Confucian's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of "assimilating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grea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Key words: Wei Dynasty, Jin Dynasty,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national integration; assimilating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